



第一師範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红色一师

HONGSEYISHIGUSHIJI

故事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校友篇】

“现代玄奘”——谭云山.....57

“与书为伴”——廖沫沙.....58

安邦——视死如归心向党.....59

半生流放 一生坚守的国际主义战士——唐有章.....60

保国安边的传奇将军——陶峙岳61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他都做到了——蔡和森.....62

南京女君子——曹孟君63

春风沐南洋，桃李满天下——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64

党的地下坚石——罗良名.....65

蹈海殉国——陈天华.....66

方金山.....67

耿耿忠心映初心——鞭辟入里的罗学瓚.....68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69

开国少将袁也烈.....70

柳宗陶.....71

彭家煌72

毛泽覃.....73

平凡英雄袁铸仁.....74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忆易永畦.....75

诗词唱和传佳话 骏骨未凋育新人——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学友情76

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刘畴西77

萧述凡78

一封遗书背后的故事——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郭亮79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80

中国金融史上的“红色大管家”——毛泽民.....81

周鲠生的法律人生82

主席“义友”——邹蕴真.....83

最后一页日历——人民的骆驼任弼时84

现代玄奘”——谭云山

在中印关系历史上，有一位就是被誉为“现代玄奘”的学者，被印度总统纳拉雅南称为“印度、中国文化之间深刻而持久的纽带的化身”。这位学者，就是谭云山。

谭云山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个书香世家，原名绍书，高小毕业后，受过新式教育熏陶的谭云山决意走出“乱世 岩，商贾罕至”的闭塞山乡，到省城长沙求学。他把自己很传统的名字“绍书”改为志存高远的名字——云山。到长沙后，先就读城南书院，1919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后，一边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同时进入船山学社研究东西文化哲学思想。

20世纪20年代前后，新的思潮风起云涌，新的思想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谭云山，这位来自偏僻农村的青年学子受到了感染，意气风发地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对毛泽东非常敬仰，追随毛泽东参加了新民学会和新文化书社。他还组织了一个叫新文学社的文学团体，编辑《新文学》周刊作为《湖南日报》星期日增刊。毛泽东离开长沙后，他又创办了新的文学团体“中兴学社”，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在船山学社学习时，谭云山遇到了太虚法师设坛讲授“身心性命之学”，不但得到法师的传授，对佛教有了一定的根底也使他崇拜印度文明，打下了他后来以印度为终生事业基地的基础。

19世纪20年代影响湖南知识分子的两大运动，一个是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毛泽东发起的。另一个是南洋，有许多新富华侨想要国内的知识分子到南洋去教华侨子女。1924年，谭云山去南洋谋职，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开始了教书生涯，教育华侨子弟，兴盛中华文化。同时积极从事写作，成了马华文学的先锋人物之一。1927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谭云山整个人生道路，他在新加坡遇见了印度诗哲泰戈尔。泰戈尔是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在印度和世界各国享有极高的声誉。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泰戈尔感到他多年的中印友好、发展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和理想有可能实现了。于是，当场决定邀请谭云山去印度国际大学教中文，开展中国研究和佛学研究。1928年8月，谭云山告别新婚的妻子，抱着“白马投荒步昔贤”的宏伟壮志，只身一人乘英国轮船离开南洋前往印度，从此开始了他在国际大学的新生活。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一面教授中文，一面学习梵文、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谭云山与六十七岁的泰翁朝夕相处，成为真正的忘年交。在

国际大学工作期间，谭云山游历印度各地，于1933年出版《印度周游记》，1935年又出版《印度丛谈》，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多方位介绍印度各方面的情况，帮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印度。工作期间，谭云山提出在中印两国分别建立文化协会、以主持两国文化交流的建议。泰戈尔进一步提议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作为交流中印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固定据点。带着这两个重任，1931年6月，谭云山回国。他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穿梭来往，将他的想法与中国学术界、文化教育界人士磋商，得到有识之士响应。其中，支持最有力的是蔡元培和戴季陶。在蔡、陶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推动下，不少高官要员包括蒋介石都对筹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1934年8月，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推动泰戈尔发起成立印度的中印学会，由泰戈尔任会长，尼赫鲁任名誉会长，谭云山与陈友生博士代表中方出席了成立大会。随后，谭云山返回国内，在蔡元培、戴季陶、泰戈尔和谭云山的筹措之下，1935年5月3日，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中印学会”成立之后做了许多重要工作。首先是在印度国际大学内设立了中国学院，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基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组织演讲、专题研究、文化考察、出版图书、互派留学生和学者等。还推动或协助安排中印两国重要政治人物的互访。如1939年尼赫鲁的第一次访华，1940年戴季陶和1942年蒋介石夫妇的访印。

抗战期间，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利思戈邀请蒋介石访印。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接受了邀请于1942年4月访印。这次访问难度极大，既不能得罪印英当局，又不可与民族领袖失和，还得襟怀坦白，实话实说。考虑到尼赫鲁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入了解，与中国感情较深，蒋介石决定以尼赫鲁为会谈重点对象。谭云山在这件工作中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幕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如安排蒋介石和尼赫鲁会谈，印英当局肯定有所忌讳，谭云山就利用中国学院院长的特殊身份，将他们请到国际大学，并一同乘火车到加尔各答举行公众活动，让他们有充足的交谈机会。与甘地的会谈，谭云山也一直陪同在甘地的三等车厢里谈了5个小时。这次访问，从事后效果看是成功的。

抗日战争期间，泰戈尔、尼赫鲁、甘地要对中国表达的信息都经由谭云山传到中国。谭云山以中国学院为基地，向印度人民宣传，不间断地发表演讲和文章，披露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驳斥日本军国主义的无耻谰言，赢得了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授予谭云山“胜利勋章”，承认他对胜利作出的贡献。

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印学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其影响还不仅仅是在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而是对两国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6年9月，谭云山被全国政协聘为特邀委员，回国观光，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萧三等湖南故旧。毛主席对谭云山说，建国以后，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当时接到信以后，起初记不起你谭云山这个人，过后却记起来了。毛主席随后问了问谭云山家庭的情况，当听说他有七个子女就开玩笑说：“你还是个多产主义者！”在提到谭云山给他写的那封信时，他说：“当时你的三点建议，我考虑了，但只能接受你的第二条。”于是，他讲了当前两大阵营，不倒向苏联是没有办法立足的。在帮助中国改善工业化方面，没有哪个超级大国比苏联更主动，这就是中国的一边倒政策的原因。

谭云山一直保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也一直保持着湖南农村文化的许多气息，不穿西装，不打领带，把中国传统服饰稍加修改，变成了特有的谭氏服装。他在圣地尼克坦有座两层楼房，房子后面朝北，在房外顶端题“望中楼”三字。谭云山1968年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享有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83年2月12日在印度菩提伽耶住所病逝，终年85岁。他在印度生活了50年，给中印两国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谭云山是一名杰出的中印友好使者，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毕生精力。他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照亮了中印友好的前路，他是中印友好大厦的一座丰碑。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特地参观了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高度称赞他“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也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可喜的是，他的儿子谭中在父亲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也是一位研究中印关系的著名学者。

“与书为伴”——廖沫沙

“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这是著名作家、杂文家廖沫沙的人生格言。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5岁上私塾。他一生与“书”打交道，与书和笔结下不解之缘。从小学三年级起，廖沫沙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2年，廖沫沙15岁那年，考入长沙师范预科、本科，读书5年。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

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沫沙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专门进行杂文创作。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这期间，廖沫沙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有杂文、新闻、社论、评论、诗歌、剧本、小说，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官僚和阔老爷的胡作非为，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还撰文《人间何世》，批评林语堂创办的宣扬“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人间世》。林语堂著文反击，掀起一场笔战。廖沫沙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理解和支持。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极其清苦。廖沫沙不但常为饥寒所困，而且难以养家糊口。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因为生活所迫而自杀，对他的打击极大。廖沫沙舍小家顾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为革命奋斗不息。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和顽强的斗争意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军事新闻编辑工作。以笔作刀枪，痛斥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仔细研读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在丧偶10多年之后，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廖沫沙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他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从1956年起，他在《新观察》、《前线》、《人民日报》辟专栏发表杂文，影响较大。主要著作有《鹿马传》、《分阴集》、《纸上谈兵录》、《廖沫沙杂文集》、《廖沫沙文集》。1961年9月，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为廖沫沙、邓拓和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1962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廖沫沙和夏衍等人开辟《长短录》杂文专栏；10月，出版杂文集《分阴集》；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五六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文革”中，邓拓、吴晗先后被迫害致死，只有廖沫沙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

历经风雨坎坷，生命之树依然坚韧挺拔，跟他的强大内心密不可分。过硬的心理素质，正是他养生的秘诀。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岁寿辰，在湖南同乡向他祝寿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第二点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读书学习，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在10年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

其中有两首七绝：

（一）

黄昏举拍冲蚊阵，四壁纷然欲献俘。

莫道平生非勇士，居然此刻大丈夫。

（二）

一战歼俘三十六，人间毕竟有英雄。

诸公自此长眠后，枕簟清凉送晓风。

这两首七绝，将打蚊子这样一件小事，写得妙趣横生，读来让人忍俊不禁。1979年，廖沫沙获得平反。平反后，廖沫沙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廖老的早点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饭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觉，晚上用温水擦洗全身，晚上11时准时睡觉。据廖老夫人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1990年12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廖沫沙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奋斗了半个世纪，是一位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一生以犀利的笔锋为党战斗的著名杂文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卫士。他所撰写的杂文、散文、论文等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廖沫沙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安邦——视死如归心向党

安邦，又名道本。革命烈士。1903年9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双江乡峡山口(今属桃江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期，他靠着父亲种佃田和出卖劳动力的微薄收入读了几年私塾。1919年考入益阳县立高等小学(原龙洲书院)后，全家不惜借债供他读书，想要他成为一名安家的读书人。1922年8月至1925年7月，安邦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本科第1部第23班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影响下，安邦决心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因孙中山逝世，军校没有按时开学，便返回家乡，在益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

他在教历史课时，十分注重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在讲授语文课的时候，把杜甫的《石壕吏》、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思想性很强的诗文，作为补充读物，指导学生阅读。1926年7月，北伐军攻占益阳，各革命团体公开活动，安邦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中旬，中共桃江区委正式成立，安邦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自此，他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革命中，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益阳县第二区党部”成立，3月下旬，他还以国民党益阳第二区党部的名义，在桃江镇举办了第一期党务训练班，为全区培训了80多名工农运动的骨干。接著，他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了宣传队，深入边远乡村宣传革命，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后农协会会员发展到4、5万人。为了保护农民运动的胜利果实，安邦组建了桃江区农民自卫队，依靠这支武装镇压了横行桃江的“十殿阎王”文玉书，惩办了一批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安邦在桃江镇召开了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万人大会，号召全体民众团结起来，保卫革命成果。大会之后，举行了反蒋示威游行，进一步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1932年1月，因叛徒告密，安邦在沅江草尾不幸被捕。他惨遭敌人严刑拷打，几次晕死过去，但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怒斥叛徒，并再三嘱咐同狱的难友，转告党组织：“在我的坟墓前树立一块中国共产党党员安邦的石碑，死也瞑目”就义时高呼“共产党是杀不完的”！牺牲时年仅29岁。

安邦牺牲后，残忍的敌人将他抛入洞庭湖。烈士安邦离我们而去，但他视死如归心向党的精神永存。

附：史实资料来自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名人谱》

半生流放 一生坚守的国际主义战士——唐有章

“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幸与不幸都化为歌唱。”

这是唐有章在自己生平档案自卷中引用的歌德的一句名言，短短18个字里凝结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颠沛流离、坎坷波折的一生。

1906年，唐有章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民家庭。1922年报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就读于本科第1部第26班。在校期间，他组织了攸县同学会，创办了《攸县同学报》。同时，受到徐特立、毛泽东、李维汉等人的积极影响，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经常转载宣传进步评论和文章，亲自撰写过鞭挞时弊的言论文章《野火烧长沙》。

1926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他非常敬佩恽代英、萧楚红等共产党人，不久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广州起义爆发，唐有章在歼灭沙河敌炮团中英勇战斗，荣立战功。

1928年12月，受中央军委指示唐有章与叶剑英等6人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自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海外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9年秋，“共大”支部在莫斯科召开大会。会上王明公开攻击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唐有章十分气愤，仗义执言道“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由中国的列宁来领导，坐在莫斯科洋楼里的‘革命家’去领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这令王明大为恼火，他被王明视为异己，扣上了“天然托派”的帽子。1930年5月，苏联当局判处他五年流刑，流放到西北边陲的买依古巴，接受劳改。这里接近北极圈，常年冰封雪冻、人迹罕至，吃不饱、穿不暖更是家常便饭。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一同被流放在此的大批专家学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唐有章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国内学到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他迫切地想掌握更多的知识。在买依古巴，大家经常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如饥似渴地向同伴们学习，像一块海绵一样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

1934年，因表现良好，唐有章被提前释放。他非常渴望回到祖国，但是当时东北已沦陷，无法回国，无奈的他只能继续辗转各地，谋求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5月，苏联党内第二次“清党”活动唐有章再次被牵连，他被捕入狱并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1938年6月，当局判处他10年流放，发落到兹拉

托乌斯特政治犯监狱服刑。面对命运的第二次重击，他仍未被打倒，凭借自身过硬的本领他一路从一名囚犯做到了工厂代理厂长，最后还被莫斯科潘斐诺夫市政工业研究院授予副博士学位。

历史是公正的，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撤回对唐有章的处分。经过漫长的等待，年近半百的唐有章终于重新收获了真正的自由，并于1958年7月登上回国的列车，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我国农机事业的发展，曾任农机部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农机部任外事局长、农机部顾问，他争分夺秒为党工作，为增进国际友谊和我国农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生革命，半生流放。唐有章在西伯利亚极寒之地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十余年光阴。历经磨难，却没能抹去他共产党人的初心，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着一份光明，最终得以在苦难中开出绚丽之花！

保国安边的传奇将军——陶峙岳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有一个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的小城，她曾经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所在地，创造了戈壁荒原变锦绣绿洲的世界奇迹，成为我国“屯垦戍边”的成功典范。这座小城就是有着“戈壁明珠”之称的——石河子。而这座西北兵团新城建设建成与两位湖南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一位是王震将军，另外一位就是陶峙岳将军。

陶峙岳，1892 年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个耕读世家。1904年至1907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之后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1916 年，陶峙岳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湖南督军署参谋处上尉参谋，同年参加北伐战争，因屡立战功，升迁至师长。1937 年 8 月，参加淞沪会战，后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1946 年，当陶峙岳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新疆时，从此，他的人生和这个偏远边陲的历史性变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49 年初，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风雨飘摇，而远在戈壁荒原的新疆成为国民党难以顾及的孤岛。2 月，代任国民政府总统的李宗仁电令陶峙岳，将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其余全部东调入关参加内战。

对陶峙岳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因为接到李宗仁命令后，国民党驻疆部队中出现主战和主和两派力量。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等人把持着驻疆部队一半左右的兵力，他们决定坚决执行李宗仁的命令。甚至在此之前，叶成等人就谋曾划杀掉乌鲁木齐保安司令包尔汉，绑架陶峙岳，纵兵劫掠全城，阻止解放军进疆。陶峙岳得到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来到七十八师师部，大义凛然地表示：“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存亡。”与此同时，包尔汉对马呈祥晓以利害，耐心规劝。终于在陶峙岳、包尔汉的共同努力下，马、叶等人交出部队离开新疆。

1949 年 9 月 26 日上午，陶峙岳、包尔汉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至此，新疆和平解放。12 月，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2 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从此新疆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岁月里，陶峙岳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深，

感情越来越炽热，要当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了。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55 年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一直住在乌鲁木齐一间平房，有人提议要给他盖一栋像样一点的楼房，陶峙岳摇摇头说：“不必花那个钱，我住这里习惯了。我们兵团现在还很穷，还有好些职工住在地窝子里，省下钱给他们盖点住房要紧。”此后他一直住在那幢平房里，直到离开新疆。

1965 年，考虑了 10 多年，也自我改造了 10 多年的陶峙岳将军觉得是时候了。他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新任兵团政委张仲翰。张仲翰接到陶峙岳的入党申请书后，对他爱党爱国的情怀十分感佩，立即向兵团党委作了汇报，党委意见一致，决定把陶峙岳的入党申请报告党中央。未料，不久“文革”爆发，陶峙岳的入党申请被搁置下来。1982 年 5 月，已经退休的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 9 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陶峙岳以 90 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获悉这一喜讯陶峙岳热泪盈眶。

1988 年，陶峙岳将军病逝于湖南长沙，终年 97 岁。王震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为他致悼词。在悼词中，王震说：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有著的！”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他都做到了

1921年1月21日，一封从法国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他在回信中激动地写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是谁的来信，让毛泽东如此关切。又是什么样的见地，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这封落款为“彬”9月16日来信，现藏在中央档案馆，是蔡林彬所写。而蔡和森，是他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此时，蔡和森正在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留居国内。因为相隔万里，一次书信往来，竟要花去近三个月的时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通过一纸书信沟通感情，激荡思想。

“润之兄，我到法竟五月，时常想写信与你。又时常暗酌。我初到时，因旧病复发。甚为痿弱。决定恢复体操游息，略如麓山故事”。信中的“麓山故事”，说的是和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故事。

近代中国风云际会，使得地处南北要冲的三湘大地得风气之先。

蔡和森，1895年出生。13岁那年，由于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去当学徒，生活异常艰，1913年，18岁的蔡和森和母亲来到长沙求学，辗转周转后，进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成为挚友。

“你就是蔡和森，听说学校转来一个作文高手，原来就是你”一个身材颇长的青年走过来：“我叫毛泽东”。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你就是毛润之。幸会幸会！最近有幅时局图，你看了吗？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吾辈青年学子，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才行”

“说的好，我想在学校发起一个读书小组，招募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探讨救国之路”毛泽东说。

“好想法，我也加入！”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紧紧握手。

于是，我们看到，妙高峰下，图书馆里，大师课上，这对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谈论人的性质、社会问题、世界大势、宇宙本源。绝对不谈生活琐事、金钱问题、男女问题。“为救国救民而读书”是二人共同的志向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100年前的湖南一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蔡”二君，很快成为先进青年的表率。同学们评价他俩“蔡和森是理

论家，润之是实践家”。他们不仅是青年们的榜样，恩师杨昌济更是亲笔写信向北大教授章士钊推荐：“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求学之余，这对20岁左右的年轻人，便常在假日相约，餐风沐雨，遍游岳麓山头，洞庭湖边，读遍“无字之书”。“一日过田垄中，见农民敲锣打鼓插田。他两便结束衣履，下田插秧。共同协作竞赛以为乐。农友见他俩来自异地，中午饷以甜酒和粉蒸肉，互相交谈各地风土人情，恰恰如一家人”。

岳麓山下的这三间青瓦小屋，正是蔡和森的故居。100年前，以毛泽东、蔡和森、张坤第等为首的一批湖南进步青年，经常来这里聚会。1918年4月14日，20多位青年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在此成立了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新民学会。学会成立后，大家对于如何实现革新愿望，并不十分清楚。多次讨论后，向外发展，寻求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恰在此时，蔡元培在北京号召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12月，蔡和森率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友，从上海出发，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在法国，蔡和森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此时的法国，自由的空气浓厚，仅《共产党宣言》就有300多种版本，30多种语言，来到法国的蔡和森，有机会全面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深入思考，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法国蒙达尔纪雷蒙特列街15号，是一幢3层楼的古朴建筑。这里曾是蔡和森等人的寓所，如今成了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在展厅里，摆着蔡和森用过的桌椅。蔡和森从小患有哮喘，在法国的工作、学习的压力和清苦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孱弱。他的妹妹蔡畅回忆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只要一推开简陋的宿舍门，就能看到蔡和森坐在窗前阅读，他苍白瘦弱，因为哮喘而不时剧烈地咳嗽！”但这都不能阻挡他对真理的追求。在蒙达尔纪杜吉公园的长椅上，时常可以看见一个东方青年，手捧《法华字典》默默研读。几个月后，这个“霸蛮”的湖南人竟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猛记猛译”为中文版。蔡和森随后有了“小马克思”的名头。

1920年7月6日至10日，正值暑期，蔡和森邀约罗学瓚、李维汉等旅法新民学会的成员，在蒙达尔纪杜吉公园里召开了以“改变中国和世界”为主题的会议，史称“蒙达尔纪杜吉会议”。会后，他们在蒙达尔纪杜吉公园留下了这张合影。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俄式共产党，走俄国十

月革命的道路，以此改造中国。会后不久，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明目张胆”建立一个组织，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9月16日，他又迫不及待给毛泽东寄去一封6000多字的长信，在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我对你的主张，没有一字不赞成”。

这就是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那封信。蔡和森也成为了我党历史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人。在这一封封闪耀思想火光的书信的碰撞中，毛泽东和蔡和森虽然身居国内、国外两个试验场，却殊途同归，各自就地创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蔡和森回到国内，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从党的二大至六大，蔡和森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等职。他创办了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位重逢的挚友，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然而，相聚还未满10年，蔡和森就在1931年遇难了。

1931年6月10日，时任两广省委书记的蔡和森出席香港海员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发前，他意识到了危险，告诉妻子李一纯：“下午一点我一定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的话就是被捕了”。一语成谶，他再也没有回来，那是妻子最后一次见到他。中午时分，蔡和森刚进入会场，早已在会场埋伏的叛徒顾顺章马上认出了他，随即被特务当场逮捕。随后，他被敌人从香港引渡到广州关押。在狱中，残暴的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浑身青紫，想迫使他屈服。1931年8月4日，国民党见蔡和森态度坚决，在他身上不会获得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情报，于是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挖去他的双眼，割掉他的双耳，刽子手用锋利的刀戳烂他的胸口，蔡和森当场牺牲，年仅36岁。

毛泽东听闻蔡和森遇难，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沉默良久后，说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做到了。”

也许，他的心头涌现的是在第一师范“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与梦想；也许，他回忆起的是建党时期两人共同经历的磨难与思索；也许，他畅想着未来两人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拼搏奋斗的前景。

而这一切，都定格在了1931年。虽然，一代革命先驱就此陨落，而毛蔡二人的友谊故事，却在岁月的长河中翻腾涌动、永续流淌。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从长沙到法国马赛，“匡时救民”的革命火种一路燃烧，铸就了蔡和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这背后是无尽的思念，无上的忠诚，更是信仰的力量。这力量可以穿越时空而永存，永远镌刻在鲜艳的党旗上。激励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永怀赤子之心，永葆奋斗精神，用行动谱写中国梦的壮丽篇章！

南京女君子——曹孟君

193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继平津、南京失陷后，徐州也落入日军的魔爪。数十次的轰炸，城内几乎夷为平地。日军又在一片废墟的城内烧杀抢掠，惨无人道地制造了一小时屠杀200多人，连婴儿都不放过的“闫窝惨案”，杀害2000多人的“汉王惨案”，屠杀200多人的“吕梁惨案”。

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在汉口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会议上，常务理事邓颖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并发出立刻去徐州前线收容难童的倡议。当时会议现场的妇女们听后虽然热血沸腾，但迟疑不决：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去解救不谙世事的儿童并将他们安全撤离，女人怎能胜任？就在大家迟疑时，一个女子毅然站了起来，坚定地说：“我去！”大家循声望向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女子，“这不是南京女君子曹孟君吗？”大家不禁一阵惊呼，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曹孟君是谁？为什么大家称她为“南京女君子”？她又为什么如此果敢地奔赴前线呢？这一切都得从曹孟君的成长经历说起。

曹孟君从小就是个“假小子”。她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自幼饱读诗书。她的两个哥哥都积极投身革命，民主、自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幼的曹孟君，尤其是目睹姐姐年轻守寡后被迫进“保节堂”，遭受封建礼教的残害，更是激励她立志冲破藩篱，反抗压迫，追求真理。

这种叛逆的个性让她的求学路异常曲折。她最早进了家乡的梨江女校，因反抗校长的压制被开除；后进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她反抗学校“不准剪短发”的规定，毅然剪下长辫子，险些被开除；1921年初，长沙城里出了件稀奇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开始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了。曹孟君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考入第一师范，被编入本科一部第21班，成为第一师范历史上第一届女学生。这时的第一师范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云集了如毛泽东、田汉、匡互生等为代表的进步教员，校园里充满民主、进步思想，让曹孟君如鱼得水，迅速成长。直到1924年，曹孟君再一次因为反对军阀无礼更换校长的罢课斗争，进而愤然离校。此时的曹孟君在进步教员的指导和新思想、新文化地影响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单是女人的命不好，一切劳苦大众的命都不好，只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中国

才有出路。之后，她辗转多校求学，192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随着信仰的日益坚定，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

她在抗日救亡的烈火中不断淬炼，并逐渐以南京为中心，致力于妇女运动。她先后组织了中华妇女爱国护士队，发起成立南京妇女界救国会，筹办南京市第一托儿所，举办妇女补习夜校，创办《新妇女》周刊等等，组织和带领各界妇女奔赴战地、救护伤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奔走呐喊，成为战火硝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1936年，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被国民党政府秘密软禁。得知消息后，社会各界奋起声讨，恼羞成怒地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抓捕了沈钧儒等7位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曹孟君立刻在《新民报》上撰文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旋即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她也因此被大家赞誉为“南京女君子”。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被关押九个月的曹孟君才得以获得自由。她来到武汉，在邓颖超领导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长期的革命实践，早已磨砺了曹孟君的意志。所以，当徐州沦陷，急需上前线收容难童时，曹孟君巾帼不让须眉、当仁不让的毅然之举，也就不足为怪了。

她不顾久居狱后身体尚未恢复，1938年4月20日，率领16名队员奔赴徐州前线。此时的徐州笼罩在战火之中，死伤儿童不计其数。疯狗撕咬，秃鹫盘旋，孩子鲜血淋漓的身体和撕心裂肺的哭喊让人惨不忍睹。曹孟君和队员们冒着硝烟和炮火，在死人堆里艰难寻找和抢救幸存儿童。几天后，他们就搜救到了200多名难童。同时，她了解到一个更为残酷的消息：日本人每到一地就会掳掠了一批中国儿童，送到日本进行奴化教育，长大后再充实到日本军队。

“决不能让难童落入敌寇的手中”，一个坚定地信念在曹孟君和队员们的心中升腾。可此时战局越来越紧迫，徐州城门日夜紧闭，根本没办法出城。终于，他们通过缜密侦查，趁着战争的间隙，带领难童向城外突围。炸弹就在身边轰鸣，队伍一次次被冲散，经过八天八夜的奔跑，曹孟君和队员们带着幸存的孩子们终于到达河南驻马店，安全脱险，谱写了一段用勇气和智慧谱写的战地传奇。

之后，曹孟君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战火中难童的救助和保育工作中。她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兼任歌乐山保育院院长等。在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全国成立了40多所的保育院，近3万名难童受到了悉心的照料和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曹孟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开展妇女工作。她是政务院第一批的

32位参事之一，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和宣传贯彻工作。她还担任国际母亲常设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和中朝友好协会理事，为妇女工作和对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妇女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真可谓：女君子，一片丹心战火淬炼，
真豪杰，心怀击楫不敢忘忧。

春风沐南洋，桃李满天下 ——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

1985年初夏,香港大酒楼灯火辉煌,宾客如云,出席酒会的港澳人士中,不乏各界贤达名流：工程师、公司董事长、电影公司出品人、舞蹈家、出版商……他们或正当壮年,或已近耄耋之年。而他们的这次相聚都跟一个人有关，那就是他们共同的师长，时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国基先生。这次酒会就是这五百位港澳界人士为张老临港接风洗尘,共叙师生之谊而举行的。

彼时的张老九十有一,从教六十余载,可谓桃李满天下。

看着自己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有四千多人已选择回国参加建设，张老顿感欣慰。席间，谈及旧事，抚今追昔，一言未毕，满座更是为之动容。

那是1920年的春天，为了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新民学会提出向外发展,派一部分同志出国了解世界。于是除组织一部分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以外,还指派一部分同志赴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张国基就是赴南洋群岛的一员。同年4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出国人员乘坐法国邮轮即将自上海启程。毛泽东亲自送他们到船上,并到每个人的房间告别。临走时,他特意找到张国基，握住他的手说：“颐生兄!你要牢牢记住‘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几个字。我们学会的宗旨,一定要切实去执行。你们除教育侨胞子女和当地原住民亲善合作以外,还要多多协助他们建国……我恭候你的佳音!”毛泽东的话让张国基倍感力量。

从1915年他考入第一师范1部13班结实毛泽东；到1918年，他加入新民学会，再到五四”运动期间,他们一起奔波呼吁,把反动军阀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共同的救国救民理想，早已让这对青年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在“驱张”斗争中，张国基更是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对这位只年长他一岁的学长敬佩有加。“改造中国与世界”，从此，也成为张国基在以后漫长海外执教岁月中刻骨铭心的座右铭。

一到新加坡,张国基即被道南学校聘为专职教员，1922年又赴印度尼西亚发展，任瓜哇加岸中学学校校长。此时，国内革命风起云涌。1926年,一心牵挂祖国命运的张国基得知北伐战争已打响,于是辞去教职,回国投身革命洪流。1927年1月,他抵达长沙,在清水塘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同窗好友重逢,彼此都很高兴,聊得十分投机。不久,毛泽东

到达武汉,即发来电报叫张国基前往武昌,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同年4月,张国基在农讲所共产党支部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张国基和毛泽东由同窗同乡好友,变成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同志。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党组织安排张国基前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之后起义失败,党组织考虑张国基的特殊状况,从宣传发动海外华侨支持革命的角度,决定继续派他从事华侨教育事业。

1928年底,张国基再次搭上去新加坡的邮轮,直到1958年回国。

在东南亚各国从教30多年里,他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宣传“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为华侨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特别是1939年,张国基与同事李春鸣等人倾其所有,在雅加达创办的华文学校——中华中学,不仅受到印尼侨界的信赖喜爱,佳评如潮,乃至整个东南亚侨界也是人人向往,众口褒扬。1958年10月,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张国基回到祖国,定居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名誉校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

回国后的张国基,虽年过花甲,但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华侨事业建设中。从1983年到1992年,他先后三次把海外部分学生为他祝寿的馈赠礼金全部贡献出来,设立了“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优秀华侨学生和优秀教师,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对于自己的小家,张国基却要求极为严格,总是教育他们要自强自立,艰苦奋斗。他只有一个儿子,至今仍在湖南老家务农。他留给九个儿孙的遗产,就是他生前保存的老掉的九颗牙齿作为永久的纪念。

1992年,张国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他的忠诚、清廉、俭朴和仁爱,依然穿透时光启迪今天!面向未来,新的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如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党的地下坚石——罗良名

罗良名,1912年2月24日,生于栗源区周家湾罗家村(今属岩泉乡),乳名定古,又名荣定。6岁入私塾。12岁,进栗源区高等小学。19岁,考入长沙广雅中学。193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于第49班。193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罗继芳,在家务农兼酿酒,所以家庭生活比较富裕,1923年,罗良名入学读书,高小毕业后,随父在家务农。1931年,罗良名经亲友介绍赴长沙广雅中学读初中,后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内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罗良名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主动接受党的培养教育,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为抗日救国,罗良名中断学业,从事党的基层工作。1936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到衡阳以开“五五书店”为名,负责衡阳到韶关地段党组织的联络和掩护工作。1937年8月,“五五书店”被查封后,组织上安排罗良名在栗源区高等小学任教。罗良名在学校除了认真搞好教学外,还建立了一个文化服务处,组织青少年学习进步书籍,激发他们的革命思想。不久罗良名便在青年中发展了姚志仁、白上素等一批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中共宜乐支部在乐昌建立,罗良名任支部书记。1939年冬,罗良名遵照上级的指示,利用友人曾贯三的关系,打进国民党栗源乡公所当干事,从中了解栗源乡公所伪职人员和栗源乡地主枪支子弹等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当时,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政策,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以罗良名为首的宜乐县工委,面对日本加紧侵略我国和国民党反共的严峻局势,临危不惧,一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发动群众开展清除汉奸、卖国贼的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坚决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在担任县工委书记时,仍以教书为掩护,从事抗战活动。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去汝城参加中共湘南特委会,他利用星期六晚上去,星期天晚上会,下星期一照常上课,不给特务察觉他有外出的迹象。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他通过当地知名人士的关系,把暴露了身份的何大群、朱上炯、朱献光、等9人一批地下党的负责人转移到宜乐边区,分别安插在栗源区三个乡的中心小学任教,学校是一个受社会尊重的地方,把他们安排在学校工作,既保障了他们的安全,

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教学作掩护开展工作，培养进步青年，为后来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骨干力量。同时为了加强同各地的联系，他还和当地士绅曾贯三、姚仲彝等，在大井头寸合伙经营一酒厂，利用往返衡阳、柳州、坪石、乐昌、韶关等地购置原材料的推销产品之际，掩护党的联系和收集情报等工作。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始终站在带领群众打击日寇的最前端。1945年在宜章县城沦陷以后，他同湘南工委的同志们组成了由上层人士为首的抗日联防指挥部和抗日办事处，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口号下，筹集了民枪1200多支，组织了一支4000多人的自卫队员。先后击退日寇6次进攻，使宜章南部广大地区免遭受日寇的璀璨。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反而更加紧对他的通缉。同年11月3日，他奉湘南工委的指示，离开宜章转往桂阳，在路途中不幸被国民党的军警杀害，时年33岁。

作为长期为党从事地下工作的罗良名，没有得到赫赫功勋，但是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我们这位伟大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内心，一直为党和人民默默奉献着，他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蹈海殉国——陈天华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9年，21岁的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归国。临行之际，作了这篇《无题》。诗中的“难酬蹈海亦英雄”，让人不禁想起14年前的那位英雄——从日本东京的大森海湾，一步步走向大海深处。他用生命表示反抗，也用最悲壮的方式，企图唤醒沉睡的国人。

陈天华1875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民主革命家。1903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称湖南师范馆）。

自幼家贫，母亲早逝，父为塾师，他和父亲相依为命，5岁时就随着父亲读书。家里条件不好，但是陈天华仍然好学不辍。常常向人借阅历史书籍、传奇小说，尤其是喜爱民间说唱弹词，他还曾编写过一些小说或山歌小调。又富有民族思想，遇乡人有称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去。

1895年，随父亲迁居新化县城，但是仍然以提篮叫卖为生。后来经过族人的周济介绍，得以进入资江书院读书，在学堂的几年里，他先是接受维新变法的思想，进而萌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感。后学堂停办，即考入省城岳麓书院潜心学习，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有人向他提亲。陈天华效仿民族英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直接以“国不安，吾不娶”，婉言拒绝，直至投海牺牲，终身没有成家。

在省城的日子，陈天华尽情吮吸着新鲜的知识。但是要想跟上时代潮流，还得去一衣带水的日本。那里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救亡图存的出路。1903年春，入湖南师范馆，旋即获的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求学。

恰在此时，沙俄不仅悍然撕毁《东三省交收条约》，拒绝撤出占领的国土；而且提出七项无理要求。远在日本的陈天华被激怒，用实际行动表达抗议。在异国他乡，陈天华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与黄兴、蔡元培、宋教仁等，结成亲密的战友。

这一年的冬天，陈天华与宋教仁、黄兴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华兴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号召，演变成一次次的起义行动。陈天华兴奋地从日本回国，亲自策划了江西军队起义。然而，事情败露后，迫于清廷的四处追捕，陈天华只得再次东渡日本。此后，他又参加了长沙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

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的战略破产，流亡日本的陈天华愈挫愈勇。1905年，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人共同创办刊物，他们用笔做武器，宣扬民族存亡的重要思想。同盟会成立后，这份刊物改为《民报》，也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陈天华又发表政治小说《狮子吼》，在小说中描绘出“民权村”，为中国未来绘制了一副美好的未来，同时把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

随着革命党人的活动频繁，清政府开始勾结日本当政者，在留日学生中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细则旨在严格约束学生行为，其中留日学生的活动要登记、给国内朋友写信要登记、除了学生宿舍不能住别的地方等规定，引起留日学生强烈不满，群起抗议，并决定全体罢课归国。

然而，这种抗争在留学生中形成了严重分歧。起初陈天华对这种行动并不赞成，宋教仁请他写文章发表意见，他都予以拒绝，；后来他见事已至此，才转而支持这一行动，并坚持主张“全体一致，万不可相互参差，贻日人以口实”。但是留学生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一派主张罢课回国，一派主张继续留在日本。本该同仇敌忾的留学生群体，此时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看热闹的日本媒体，更是讽刺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放纵卑劣”。

本就性情刚烈的陈天华，眼看着局势越来越恶劣，国民们还如此麻木不仁，当即决定效仿屈原，蹈海自绝，以警示众人。“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留下了万言《绝命书》。当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学生和社会各界群情哀伤。31岁的陈天华，宛如流星一般，照耀了中国革命的征途。

纵身一跃，男儿风骨，陈天华深深影响了当时的留学生。秋瑾因此更加坚定革命的斗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英勇就义，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名句。另一位沉默的书生，在日本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子，拯救国人麻木的灵魂，他就是鲁迅。钟以能鸣真警世，人为猛醒望回头，世间再无陈天华，伤心独蹈海东流。

方金山

方金山，1904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1年春，从平江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他学习刻苦，受到当时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影响，他思想进步飞快，立志为富国强民做一番事业。1923年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继续学业，而是回到家乡，筹办织布机行，招收本地贫困农民当工人，希望能大干一番事业。但是由于缺乏从商经验，又受到外地布业的冲击，织布机行只办了4个月就被迫倒闭，他自己也背负了巨额债务，被迫出走。

1926年夏，正值大革命时期，流落至江西的方金山得知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于是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五师。碰巧这个师的党代表是曾任第一师范学监主任的方维夏老师，两位校友在异乡相逢，很快便熟悉了起来。在方维夏的引荐下方金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派往中共湖南区委工作，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年冬，方金山调至浏阳县杂税局工作，这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负责接待来往同志和各地组织之间的联系。马日事变后，方金山因他人告密被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他毫不动摇，死死咬定是被人陷害栽赃，自己是税务人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警署仍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判他15年徒刑，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

1927年12月10日长沙爆发了“灰日暴动”，方金山和狱友们乘机砸开了牢门，冲了出去。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他再次被捕入狱，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挺身而出将越狱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遭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就这样方金山在暗无天日的狱牢中度过了三年时间。终于，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红3军团攻克长沙时，他和狱友们再次冲出监狱，得以逃脱。

出狱后，方金山随即参加了红军，8月5日任红三军团第5军第1师2团副团长兼参谋长。8月底，红一、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为清除敌人在环城四周布下的地钉，确保部队顺利攻城，在枪林弹雨中方金山抄起步枪上前铲除地钉，在这过程中他不幸负伤，右腿致残。后被安排在地方工作。1931年9月调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秘书。同年11月在一次转移途中与敌人发生冲突，方金山因行走不便以身殉职，年仅27岁。

耿耿忠心映初心 ——鞭辟入里的罗学瓚

伤心国家事，勇猛直前行。

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

这是23岁的罗学瓚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写下的革命誓言。这位革命烈士用37岁的生命信守着自己最初的革命理想，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罗学瓚，原湘潭县，现株洲市马家河人，与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是第八班同窗好友。曾经的罗学瓚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受好友毛泽东的影响开始注重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他经常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帮好友，到湘江游泳锻炼，登上橘子洲头，畅谈人生理想。1918年他成为了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留法学习期间，他一面与产业工人一起劳动生活，一面阅读有关马克思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他深深的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1921年10月，因参加留法学生维权活动，罗学瓚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11月，罗学瓚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

当时，毛泽东正在筹备建立中共湖南湘区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更好的了解工人的情况，罗学瓚从一名普通人力车工人做起，并通过主办工人夜校，同人力车工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工人们“亲密的朋友”。

1925年，罗学瓚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去湘潭改组国民党县党部，随后任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醴陵农民运动。为迎接北伐军入湘，他在醴陵组织平民救国团和农民武装队，并调工农武装协助叶挺独立团占领了醴陵县城。为推动农民运动更快的发展，他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农协会员人数猛增20多万，使醴陵成为全省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29年，受中央派遣，罗学瓚到浙江领导省委重建工作，因通信联络暴露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使用了老虎凳、压杠子、提鞭抽打、烙铁烫等酷刑，他始终严守党的纪律，没有吐露任何机密。后因叛徒出卖，敌人识破了他省委书记的身份，将他转移到了陆军监狱重点关押。

在狱中，罗学瓚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他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购买了一些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组织狱中难友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给

工友们讲解马克思主义，鼓励战友们：“革命者的悲剧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精神的萎靡，意志的消沉，对革命失去信心……”1930年8月27日，一阵阵枪声划破杭州凌晨黑暗的天空，罗学瓚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他从容地穿好衣服、鞋子，与战友一一握手抱别，坚定地说道：“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就是光荣的，大家不要难过，希望大家努力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说完便昂首转身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7岁。

1961年，谢觉哉专门挥毫作诗，称赞罗学瓚和另一位烈士陈佑魁：

浑身是劲陈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瓚。

远瞩高瞻天下少，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

如今，罗学瓚的家乡已经成为了一个动力产业之国，一个创新创业之城，一处宜居宜衍之地。罗学瓚一心为民、忠诚为党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有33名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著名高级将领为军事家。在这33位军事家中，有这样一位先辈。他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他对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最后因“肃反”被错杀。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他签发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段德昌。

1904年8月，段德昌出生在湖南南县。父亲是一位新式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段德昌小小年纪就以诗文对联出口成章而小有名气。良好的家教造就了段德昌儒雅的气度，文能提笔、武能横刀，使他日后在红军将领中卓然而立。

少年时代的段德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还与留法归国的中共党员何长工等一起合办新华学校，联合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1921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以省督学的身份，与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陈书农到安乡考察教育。上任才两个月的督学严世杰向毛泽东介绍南县教育情况，自然有“才来不久，了解肤浅的谦语。客人们也就问起由来，于是扯出了段德昌。原来早些时候，这里闹过一场风波。原任督学贪污，把伙食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学生们起来造反了，领头者就是段德昌。上司平息风波的手段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段德昌受了警告处分，原督学被撤职。毛泽东听了，想见一见这个“有勇有谋”的段德昌。恰好，在长沙商专读书的段德昌这段时间回家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听县劝学所有召，便急匆匆地赶到文武庙。就这样，段德昌——日后中共重要将领，毛泽东——日后中共领袖第一次握手了。

1925年9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扣押、迫害共产党人，段德昌积极建议“青年军人联合会”给蒋介石写公开信。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逮捕写信者，并开除了段德昌。后经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进入“中国国民政治讲习班”，后又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培训班，结业后到第6军工作，并参加北伐战争。此后，段德昌开启了属于他的辉煌时代。1928年6月起段德昌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率部在监利、沔阳交界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929年10月，段德昌在聂家岭击溃了比游击队多10倍兵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游击队首次在洪湖战胜敌正规军的辉煌战例。1930年2月后，段德昌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第2军团第6军政治委员、军长，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参与创建及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1年4月段德昌任红3军（红2军团改编）第9师师长，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从此，段德昌成为远近闻名的“常胜将军”，与贺龙并称为根据地两“龙”，民谣传唱“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中，有个“十六字诀”——“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是段德昌与周逸群一道总结出的战术，与1930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有同曲异工之妙。

1933年，由于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战功赫赫的段德昌被错杀，年仅29岁。5月，湖北鹤峰县金果坪。段德昌平静地走向刑场。面对行刑的步枪，他说：“用刀吧，节约一颗子弹，打敌人。”临行前，他坚定地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不管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我都永远相信党、忠于党。”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郑重提议为段德昌平反。6月17日，段德昌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担任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1952年8月3日，毛泽东为段德昌烈士家属签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上写着：“段德昌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

千千万万如段德昌一样的英烈他们以青春之力唤起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他们，以鲜血浇灌民族振兴的理想；他们，以生命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百年历史风华，时光变幻着不同的面孔，不变的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奔向星辰大海的脚步。

开国少将袁也烈

1959年9月30日晚上，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人潮如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正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宴会上，一位身着元帅服的慈祥长者，端着酒杯，来给陆海空三军将领敬酒。当他走到一位海军少将跟前时，凝望了一会，满面笑容地说：“营长同志，好久不见了。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这位年届花甲的少将，突然像个小伙子，变得腼腆起来，正想答话，一位身着中山装、浓眉大眼的首长，也来到跟前，笑着开口说：“老总，不能记仇啊！不打不相识嘛！”元帅笑道：“不是记仇，是记住了我有过这么一位好营长哩！”

这位长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而身着中山装的则是周恩来总理。那么，这位海军少将是谁呢？朱德和周恩来说的这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海军少将，就是时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参谋长——袁也烈。

袁也烈，1899 年生于湖南武冈（今洞口）。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在本科第一部21班，直到1924年肄业离校。在湖南一师期间，他深受毛泽东等人的影响，积极参加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各种活动。1924年，怀着“救民于水深火热”的赤子之心，袁也烈从湖南来到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广东，投笔从戎，考入桂军军官学校，从此便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1925年7月，袁也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时任叶挺部下第24师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奉命率部开赴南昌。

七八月的南昌，已值酷暑，闷热异常。7月30号下午，从叶挺处接到夺取控制南昌城东门任务的袁也烈，马不停蹄地赶回军营。此时，他全身大汗淋漓，军服湿得能拧出水来，但他顾不得这些，因为上级要求全师要在一个晚上全部解决战斗。如果延误时间，战局就复杂了。

打仗先要摸清敌情，做到知己知彼，派谁去进行侦察呢？袁也烈回到营部，首先考虑的便是这个问题。最后经慎重考虑，他决定自己单独去进行一次化装侦察。

7月31日清晨，袁也烈脱下军装，穿上一件长袍，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向城东

走去。就这样，他几乎走遍了营区的每个角落，了解到不少情况，特别是摸清了驻扎的敌人兵力比师部原先估计的要多得多，于是，当即制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

下午，袁也烈营来到东门外，以部队刚到、找不到宿营地为借口，就地在东门外驻敌营房前面露天宿营。夜深了，按照袁也烈的部署，战士们悄悄地行动起来，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等待起义时刻的到来。8月1日凌晨1点，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南昌城里顿时枪声大作。袁也烈一声命令：“冲啊！”部队像潮水般冲进敌军营房，经过两小时的英勇冲杀，东门守敌伤亡一部，其余全部投降。袁也烈胜利完成起义总指挥部交给的任务。这时，南昌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袁也烈命令战士在东门一线设置掩体和路障，以防敌军逃窜。忽然，看见一个40多岁的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骑马过来。袁也烈厉声喝道：“站住！”那位军官翻身下马，袁也烈就带着战士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然后让副官把他押进营房，并向指挥部报告。不一会儿，副官慌忙跑来报告，说周恩来告诉他，刚才抓的那位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什么？糟糕！”袁也烈连忙跑去“请罪”。朱德却哈哈大笑，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夸奖说：“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这就是开篇提到的“不打不相识”。

1931年，袁也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判刑5年。1935年出狱后一直从事抗日军政干部的训练工作，为我党培训了一批又一批抗日干部。1942年，袁也烈被调任山东清河军区参谋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指挥部队，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蚕食，胜利地保卫了抗日根据地。1949年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建设强大人民海军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从陆军到海军，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袁也烈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讲价钱。1960年，袁也烈兼任国家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在北京逝世。

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位优秀的高级将领，袁也烈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实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学习，发扬！

柳宗陶

柳宗陶，又名二吾，字加葛，1894年12月1日，生于湘乡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910年，柳宗陶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与毛泽东一起编入戊班，后来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1部第10班，又与毛泽东为校友。

1918年夏，他在一师毕业后返回湘乡，以教学为业。1923年春，他结识了前来湘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王则鸣，在王的启发和帮助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夏，柳宗陶出任新成立的县教育局局长，为促进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推行了许多措施。他发起组建了湘乡县教职员联合会；创办了县立妇女乡村师范学校；同时改革了传统的教育行政费支付办法，规定不分公私，只视优劣作为评判标准，予以拨发经费。这激发了各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得益于这些措施，全县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仅仅半年时间，全县高小增至30余所，初小增至千余所。其他学校也相继成立，而且各所学校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

同时为了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他积极发展工、农会会员。还联络各革命团体，通过了许多利于惩办土豪劣绅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提案，大大鼓舞了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湘乡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

1927年5月28日下午，一支雄纠纠、气昂昂的工农义勇军挺进在潭宝路上。柳宗陶英姿飒爽走在队伍的前面。原来，马日事变后，他根据召开的军事会议的部署，在湘乡召开了“反蒋讨许”誓师大会，正率领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前往湘潭。在前往马托铺的途中与许克祥前卫连遭遇，展开激战，脱险后的柳宗陶来到了长沙。由中央决定派往苏联学习，他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柳宗陶心中欣喜万分，决心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奋斗。虽然在此他一度受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排斥与打击，但他心中崇高的革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反而愈来愈坚定。

虽身在异国他乡，但苦难中的祖国常出现在柳宗陶的梦乡。1931年，他完成学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安排在上海党中央出版部秘密印刷厂担任经理。正当他决心为党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32年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他化名贺树人，敌人多次威逼，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因而一直留监关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硝烟弥漫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柳宗陶也终于获释出狱。他拖着病痛的身体还是决心继续参加革命。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柳宗陶来到陕北，找到了党组织，并被派往山东工作，任胶东特委书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胶东也成为华北和华东八路军联系的重要枢纽。1939年3月，他又率部配合罗荣桓率领的一一五师一部进入沂蒙山区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不幸的是，柳宗陶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抓住，旋即被秘密杀害，时年45岁。

毛泽覃

1905年10月3日，毛顺生和文素勤有了他们第三个儿子毛泽覃，此时，身为长子的毛泽东已经12岁了。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去外地读书，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家中的小不点毛泽覃。毛泽覃跟毛泽东长得很像，圆脸，大眼睛。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毛泽覃受到的管束比两个哥哥都少，他自小顽皮，是个一般人管束不住的“捣蛋鬼”。可对大哥毛泽东却是一百个信服，因为，每次大哥从外面回来，谈吐之间透露出的那种思想和气质，都与父亲毛顺生那一代人大相径庭。父亲的话让毛泽覃感觉“旧”，而大哥的话却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吸引力。

1919年，14岁的毛泽覃在毛泽东的监护下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从一师附小毕业后又进入长沙私立协均中学，后又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他住在清水塘，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生活，并承担毛泽东交代的一些工作。

长兄如父，毛泽东对毛泽覃照顾有加，着力培养。毛泽覃从小机智过人，长大后更有一股冲劲，毛泽东觉得已经17岁的毛泽覃适合到工人运动的风口浪尖去闯一闯。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去安源寻求经验，想要建立工人俱乐部。毛泽东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派毛泽覃去水口山协助蒋先云从事工人运动。

毛泽覃从长沙乘坐小火轮赴衡阳，毛泽东和杨开慧到码头送行。毛泽东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叮嘱三弟务必严格要求自己，要与工人打成一片。水口山矿是湖南境内最大的省立官办工业，有3000多名工人。在水口山，毛泽覃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工人学校教员。他用教学做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覃年轻，有朝气，很快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们肯跟他说实话、说真话。毛泽覃则用浅白的语言，激发工人人们的斗争积极性。

他说：“挖煤的工人没有煤烧，织布的工人没有衣穿，种田的农民没有谷吃，不是我们生来就穷，是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工人们问怎么办，毛泽覃说：造反！

毛泽覃在发动工人之前，把水口山的情况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汇报，并问大哥毛泽

东：水口山工人要造反行不行？毛泽东告诉他，工人造反，天经地义。

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令全省震动。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立刻派专员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又调派军队妄图武力镇压。

毛泽覃接到上级指示，一面率领大家稳住军队，向士兵宣传革命思想，让他们保持中立，一面向全国各地发出请求援助的电邮和传单，制造舆论上的同情。声援的电报不断朝水口山飞来，工人们沸腾了。

资本家两次企图“暗杀”罢工领导人蒋先云，但均告失败。工人们得知后，把矿务局办公楼团团围住。当局又开始下“请帖”，请工人代表去谈判。这是一场鸿门宴，去还是不去，工人们犹豫不决。毛泽覃想到一个好办法，他主张去，提出自己可以暗中监视，如果资本家敢轻举妄动，对工人代表不利，他就立刻敲响铜锣。这一提议获得大家一致赞同。

按照约定时间，蒋先云来到了谈判地点。可双方还没说几句，打手们就上来了。躲在暗处的毛泽覃见状，立刻敲响铜锣，工人们闻声而动，举着各式土制武器，一拥而入。目瞪口呆的资本家只好乖乖在工人们提出的条约上签字。水口山大罢工以胜利告终。

毛泽覃用一记响锣，奏响了首战胜利的乐章。而他身上的两个特质，一个“灵”，一个“勇”，让大家甚是佩服。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在敌人的围追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他们藏身于山林，饿了，就挖竹笋、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水；冷了，就躲进山洞，靠着茅草过夜。后来被叛徒出卖，带着敌人把毛泽覃和几十个战士团团围在一间小房子里。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战斗中，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珍藏的红星奖章丢在了小溪边的杂草中。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给他的至高荣誉，他不想让它落入敌手。然后，他倒下了。这一年，毛泽覃年仅29岁。在他身上，敌人只搜到一张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另外还有一个党证。

五四乡土小说家——彭家煌

彭家煌，又名介黄，字 生，号韞松。189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自幼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本科第一部第12班，1920年毕业。

彭家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三十年代出色的、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然而由于时代环境的黑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个人生活的困顿不堪,这位本该更有建树的作家年仅三十五岁便英年早逝。其生平和作品被长期尘封，湮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鲜有人重视和发掘,导致这位杰出的作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文学地位。

彭家煌的作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受到了冷遇，这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经历了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以及激进探索的建设时期，文学在时代话语之下，展现出新的历史面貌，在某些时候甚至偏离了自身的发展轨道。在某些时刻文学从属于甚至依附于政治性的评判话语。因此，彭家煌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不受重视，首先就与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有关。据考证，彭家煌确实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在革命年代表现出积极的战斗精神，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刊《红旗日报》的通讯员，其后“因共产嫌疑”被捕，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后仅两年时间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这样一位优秀进步的作家却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去世之后就被不怀好意者打着悼念的幌子行污蔑之实，但在当时政治高压时期知道真相的战友亲人无法及时辩驳。叶紫在作者逝世七个月之后才有机会替他辩屈，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又不能公开反驳，只能以说反话的特殊方式来表达愤怒，对于不知情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式也可能会加深对彭家煌的误解，因此，长期以来彭家煌蒙受了不白之冤，虽然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向彭家煌家属颁布了《病故革命工作人员证明书》，解除了研究彭家煌作品的政治障碍。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困扰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给进一步研究带来困难，制约了对彭家煌作品价值的探索与挖掘。直到1978 严家炎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彭家煌的生平与创作年表》，在这一时期的彭家煌小说研究中起到拓荒性的重要作用，是梳理彭家煌作品的重要凭证。为下一阶段的小说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彭家煌他一生中坎坷贫困，但在事业上却是一往无前，勤奋创作。从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直至离开人世，短短9年，出版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皮克的情书》等6本小说集，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集、童话故事。均立于二、三十

年代优秀杂文之林。其作品大多数是描写受压迫的苦难民众，他逝世后，矛盾几次撰文赞扬他追求“光明的浑朴的信仰”。

平凡英雄袁铸仁

湖南第一师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上个世纪前半叶，面对山河破碎、国弱民穷的中国，一师人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责任与担当，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着光荣与梦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袁铸仁就是其中普通而又让人敬仰的一位。

袁铸仁1897年出生于湖南益阳。自幼勤勉好学，志存高远。1915年考入益阳县龙湖书院，受进步教员的影响，积极组织和参加反日货、反封建礼教等活动，被开除学籍。1917年，第一师范在益阳招考两名优等免费学生，他因成绩优异被录取，被编入本科第1部第15班。

进入第一师范求学后的袁铸仁刻苦求学，并迅速与志同道合的夏曦、郭亮、张国基等人结为挚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1年，袁铸仁从第一师范毕业，回到益阳各地小学从事小学教育，他积极组织进步民众和学生上街游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并发动和组织了益阳各界进步人士成立“雪耻分会”，揭开了益阳革命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922年，在夏曦的介绍下，袁铸仁在益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两位党员成立了益阳第一个中共小组，并于次年11月，与廖剑凡等早期共产党员在益阳兰溪正式成立中共益阳县委，袁铸仁担任县委书记。他在益阳办救贫工厂，并成立农民协会、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及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等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建立农民武装，积极开展清缴团防、减租减押等运动。他的进步思想、坚定信念和杰出领导才能，成为益阳革命史上当之无愧的杰出先驱。

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遍及湖南。袁铸仁不顾国民党反动派悬赏捉拿，依然秘密领导县委全力进行武装斗争，不幸被捕。被捕后，国民党益阳团防局长曹明妄图想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在龙州师范置办酒席款待，进行劝降。袁铸仁愤然掀翻酒席，义正辞严地对曹明等人进行痛斥。恼羞成怒的曹明将袁铸仁关进狱中，并施以各种酷刑逼供。袁铸仁始终宁死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和党员同志的消息。1927年8月，残忍的敌人用铁丝穿过袁铸仁颈下的锁骨，拖拉着前往益阳市大码头示众，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袁铸仁终因惨无人道的折磨壮烈牺牲，年仅30岁。

袁铸仁的一生虽短暂而平凡，但他为革命奋斗不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身取义

的崇高品格将永远篆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而今，益阳重修了袁铸仁烈士墓，并建立了烈士陵园，以此激励后人在新时代弘扬革命先辈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书写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篇章。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忆易永畦

1915年5月23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内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气氛，原来两个月前因染病不得不回家养病的一师学生易永畦在归家后终因身体虚弱引发肺结核不幸逝世，年仅23岁，消息传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全校震惊，师生们无不感到悲痛。今天，一师师生们聚集在一起只为共同缅怀这个鲜活生命，由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学友会学生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师生共送挽诗挽联256幅，并编印成册，题为《易君永畦追悼录》。

易永畦名昌陶，字咏畦，1892年生，衡阳人。易永畦天生聪颖，与普通小孩子不一样，端正庄重，说话很少，行为举止有规有矩。最初由爷爷在家教他，四、五岁的时候，爷爷就用立身大事教育他，有过错就责罚，没有丝毫溺爱与宽宥。之后二十余年，易永畦的立身诚信、做人做事没有瑕疵过失，为同乡同学所公认。在爷爷身边四年时间就通晓了四书五经等书。13岁时离开家庭进入本县的高等小学。入学后，更加刻苦自觉、发奋读书。在校4年，除寒暑假外，一年仅回家一两次。由于读书启蒙早，易永畦在历届同班同学中年纪也最小，考试却常常第一。易永畦曾对同学说，现在的学者“忸怩浮夸、堕落不理事，更有甚者刑挫天性、毁坏操行、扰乱风教，却都安心而没有恐惧。人心风俗歪邪或肃正，国家会因此而兴盛或衰颓。所以不安定的国家应当拯救，尚不如溺陷没有廉耻的人心应当拯救那么危急。拯救不安定的国家已是难事，但还不及拯救溺陷没有廉耻的人心那么难啊。今天的学者每天说救国，但不求修身吗，却舍近求远，本末倒置，这就显示了他们的糊涂。”

同学赞同他的说法，更佩服他的为人。易永畦沉稳醇厚，没有暴躁急躁的言语神色，喜欢称赞别人的好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坏处，忠诚对待老师和朋友，言而有信，这些品质，十分难能可贵。

1912年春天，易永畦与同乡王 哲从衡阳出发，一起游学长沙，一同参加考试，一并录取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易永畦结识了毛泽东、罗学瓚、蔡和森等有志青年，收获了诚挚热情的友谊易永畦从小就体弱多病，无法剧烈运动，他便默默地为操场上运动锻炼的同学看衣服。他经常悄悄地帮毛泽东缝补好破了的鞋子，临近期末，他还帮忙泽东连夜复习数学。邹蕴真与易永畦居住在同一间寝室。好友邹蕴真曾回忆说，在学校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易永畦用美玉一般优

秀的才华与情操来提点和保护我这如顽石一般愚笨的人，可惜我就像臭椿麻栎一般无用。当他的身体染上小病，我们朝夕待在一起，那段时间，易永畦对我的教诲实在是很多。易永畦回家乡衡阳，虽有王 哲与他同行，但一想起他乘着小船，就觉得他是独自划着孤舟一般。大雁那嗷嗷的叫声让人觉得天空是无比的辽远，那号号的风声让树木也更显稀疏，真是让人增添了无尽的离别之情啊！没有一个同学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面对挚友的逝世，毛泽东挥毫写下一首悼词，诉尽了他对友人的无限思念，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踟躅城南隈。

城南草萋萋，潸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瀣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诗联中饱含“悼念学友，毋忘国耻”之意。当时，正值袁世凯屈服于日本政府压力，接受丧权辱国的21条。无耻的当权者对外软弱无能，为了个人私利竟拿国家和民族利益做交易，让人真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毛泽东以秋雁春水回顾往日和同窗好友的情谊，追忆曾经一起在校外散步，倾谈心曲，抒发抱负的情景。悲叹好友过早地夭亡，使得他们曾经有过的一道远游的计划，还有毕业以后到广阔天地里施展才华的雄心壮志，都被这无情的死神夺取了。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煎，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什么是真正的同学情深，什么是真正的气魄天下，热血男儿应当担负重任，救国救民，“今日之责任，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女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诗词唱和传佳话 骏骨未凋育新人 ——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学友情

他是与毛泽东情谊甚笃且通信最多的旧友，跨越63年的相知相惜，几十封书信见证了他们从“恰同学少年”的风华正茂到“骏骨未凋”的壮志豪情；

他是被毛泽东称为“贤者与能者可以兼的人”“是一个真能爱我的人”，他们少年同窗、志同道合，是益友，是挚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诗词唱和，畅谈古今，是诗友，更是诤友。

他就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师范第一任校长——周世钊。

周世钊，字元、敦元，号东园，1897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石子冲一个农民家里。这是一个距离韶山冲大约15公里的小山村，周家人多田少，生活虽清苦，但天资聪颖的周世钊自幼便由父亲亲自教授《大学》《论语》，12岁那年进入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堂，在这里学习了四年。

1913年春，周世钊从小学毕业，人生何去何从的问题困扰着这个16岁的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个学校学制五年，以培养小学教员为目的，不仅不收学费，还会发放一点补贴。这让周世钊眼前一亮，毅然决定前往长沙。经过初试和复试，周世钊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第四师范。而这次入学考试拔得头筹的正是19岁的毛泽东，他以一篇《普胜法，毛奇谓当归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获得了满分。毛泽东和周世钊同时被编入第四师范预科一班，第二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两人又同时随校并入第一师范，并同时编入第一师范本科一部第八班。由此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友情谊。

在第一师范开放包容的校园环境里，在杨昌济、徐特立等一大批名师的精心栽培下，毛泽东和周世钊等青年学子如鱼得水，迅速成长。毛泽东好学不倦，善于钻研，他克己宽人，治学严谨，言行一致，作风谦逊并且有伟大抱负；同时他富有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具备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先生们以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周世钊炽烈而顽强的好学精神，以及他为人温和敦厚，待人赤诚的品德，尤其是文学、诗词的造诣方面，为师友同学广为称赞。1917年，学校举行

“人物互选”活动，全校12个班，575名学生参选，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以49票稳居第一，且德、智、体三项均有得票的也仅为他一人。而周世钊以47票名列第二。

此时的毛泽东和周世钊可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毛泽东在学友会担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则任文学部部长；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周世钊全力支持，并担任夜学管理员；毛泽东组建新民学会，周世钊积极响应，成为首批会员……在那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携手并肩，傲立于时代潮头。

1918年夏，毛泽东、周世钊等青年学子完成在第一师范的学业，即将奔赴各自的人生征途。此时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决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前往北京筹备相关事宜。而周世钊受徐特立老师的言传身教，矢志从事教育，来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湘后，应周世钊之邀，任修业小学高小部历史教员，与周世钊住房只隔一层木墙。严冬季节，毛泽东感到寒冷难受时，就卷着被子到周世钊床上共睡。在修业小学期间，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周世钊作为助手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两人虽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各有所持，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敬重与支持。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生性温和、做事缜密的周世钊进行交流和探讨。毛泽东当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东奔西跑，结果他自己却没有一同出国，很多新民学会会员对此极为费解。对此，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地剖析：“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中国，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如果把时间花费给国内，则对国家更有利。”他在信中还诚恳地交流了自己的近期规划，并且写到：“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字里行间，学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力透纸背，悠远绵长。

可惜，两人的“计划”和“行动”终究未能完全一致。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式，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的革命道路。此时的周世钊痴心于教书育人的初衷，并且考入了南京东南大学继续深造。之后先后在周南女子中学、第一师范、长郡中学、长沙师范等处教书，矢志不渝地为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振兴贡献者自己的力量。虽然不再并肩战斗，但心意是相通的。周世钊无时不关心着毛泽东的安危。1945年8月，周世钊得知毛泽东为争取

和平建国奔赴重庆时，虎穴龙潭的重庆时，他不顾风险毅然致函问候。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被任命为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率全校员工和校友会分别发电报向毛泽东致敬并报告学校接管情况，毛泽东于8月12日回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是：“省立第一师范周世钊先生：虞电敬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体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敬复。并颂教祺。”给校友会的回电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诸先生：虞电敬悉，极感盛意。希望诸位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28天，周世钊再次寄信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仅45天之后的1949年11月15日，毛泽东即回信给周世钊说：“迭接电示，又得10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从此，两人便开启了鸿雁传书、诗词唱和的频繁神交，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多达20余封。其中有学友间的叙旧感怀，有文友间的博古论今，有诤友间的探讨时事，更有诗友间的诗词唱和。留下了《五律 过许昌》与《水调歌头 长沙》的互赠，也留下来《七律 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与《七律 和周世钊同志》的唱和。学友情深，诗友雅趣传为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周世钊虽分属两地，但往来交流很多。毛泽东到湖南考察调研，都会约见周世钊；周世钊来北京开会或学习，毛泽东也总会抽出时间与老友见面。在交往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欣赏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敢于讲真话。周世钊则时刻以毛主席所言“骏骨未凋，尚有生气”自勉，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在湖南教书育人，先后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

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在长沙逝世，同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也与世长辞。然而一代伟人与学友之间长达63年的真挚友谊并未因此落幕，而今，在他们结缘的第一师范校园里，依旧传扬着他们当年恰同学少年的青春往事，毛泽东致周世钊函中“为人民文教事业服务”的指示一直是一师人前进的方向，两人叙旧时所言“一师是个好学校”化作无穷动力，激励一师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刘畴西

在中国共产党的众多优秀将领中，有这样一位将军，他在征讨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中失去左臂，一战成名；他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被苏区人民称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在敌人的监牢里，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他就是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的狱友“田寿”——中国工农军第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

刘畴西，1897年出生于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沙围子竹篱笆屋场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天资聪慧，深受长辈喜爱，尽管在8兄弟中排行老五，但仍得家庭偏爱，极力供他读书，以期光耀门庭。1912年，刘畴西与郭亮同班，就读于长沙县第四高等小学。1920年秋，刘畴西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直至1924年毕业。在第一师范四年的学习中，受毛泽东、郭亮等人的影响，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922年，刘畴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刘畴西来到湖北旅鄂小学执教。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刘畴西悲愤不已，决心投笔从戎。1924年，经党组织推荐考取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同年10月，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作战。品学兼优的刘畴西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旋任黄埔军校组编的第一教导团第三连党代表。

1925年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攻打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刘畴西随部参加东征。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棉湖战役中，刘畴西举着军旗的左臂不幸被敌军机枪击中，顿时血流不止。但战况紧急，他深知战旗是官兵的精神支柱，强忍巨痛用右手高举战旗直抵叛军指挥所，直至击毙叛军头领。棉湖战役展现了黄埔实力，奠定了黄埔军威。但由于伤势过重，刘畴西永远地失去了一条左臂。他坚毅地说：“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可牺牲，割掉一条臂又有何妨？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

此后，这位骁勇善战的独臂将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誓言。先后四次成功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疯狂的“围剿”，战功赫赫，被苏区人民称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1934年12月10日，刘畴西率部进抵黄山东南的太平县汤口，准备继续北进。这时，蒋介石调集5个师、2个独立旅及浙皖4个保安团，向红十军团围堵过来。两军在乌泥关激烈交战，由于敌人迅速增援乌泥关一带，红二十师、二十一师伤亡惨重，十九师师长寻淮州牺牲。1935年1月20日深夜，刘畴西率部在许坞作了最后一次长达5小时的激战，终没有成功突围，且仅有的右手也遭枪伤，这样，刘畴西与部队失去了联

系不幸被捕。而当时的方志敏正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于1935年1月24日被敌搜山部队抓获并一起关押于南京政府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

刘畴西入狱后，枪伤未愈，又患上伤寒，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但他仍坚强地和敌人斗争，挫败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蒋介石曾下令，一定要将刘畴西“争取”过来，于是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要职的黄埔老同学纷纷前往狱中探望、劝降，但是刘畴西毫不为之所动。敌人没有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诱降也失败，使得敌人无计可施，1935年8月6日凌晨，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的秘密刑场，临刑前，他高呼：“你能砍下我的头颅，但你能动摇我的信仰吗？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英勇就义，年仅38岁。

时光荏苒，英雄远去，如今刘畴西的家乡望城靖港已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家乡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但那个英勇善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永远成为激励人们不懈奋斗的动力。

萧述凡

在第一师范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份对萧述凡同志的生平描述的珍贵文献——《萧述凡同志事略》。“萧述凡同志，是个革命的青年，而且是我们青年的领袖，模范者。他死的时候，年级刚才二十五岁。”这一篇已被岁月模糊地看不太清晰的文章记录了萧述凡同志短暂却辉煌革命的一生。

萧述凡（1901—1926），又名树藩，1901年生。父亲早年病故，他们兄弟四人，均由母亲抚养。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只读了三年半私塾就辍学了，靠卖柴和替人放牛谋生。直到十六岁时，才得到族人和亲友的资助，进了云山高级小学堂学习。由于他年龄大，身材又长得高，同学都叫他“大学生”。他全然不顾，只是更加勤奋地学习。老师王一凡很欣赏他的文才，常常将他的作文评为甲等，并在课堂上朗读，这使他备受鼓舞。此时，正值五四运动期间，在校长王凌波和教员谢觉哉等提倡思想解放，自由探讨的背景下。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进步运动，写了不少颇有见解的白话文，有的常被校刊选用。他还敢于用白话文向旧势力宣战。这年冬，宁乡县知事余联辉到云山学校视察，给高年级学生出了一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论”的作文题，规定一律用文言文，不准写白话文。他不畏权势，偏偏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批评封建道德的文章。

1921年夏在云山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是他的国文老师。毛泽东喜其品学兼优，曾在萧述凡的一篇作文上写评语“（xu）哉夫子，企予望之”，可见毛泽东对其寄予厚望。先后将他吸收加入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后萧述凡创办《宁乡旬刊》，又在《大公报》《湖南通俗日报》，广州、上海等地报纸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由郭亮、夏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

也是在这一年，国共合作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萧述凡以个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久，“五卅惨案”发生，萧述凡参与发起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发动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同年，他与郭亮、柳直荀等发动省会各界数千人，举行祭奠会和追悼会，揭露赵恒惕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

1926年春，赵恒惕被迫辞职，湖南革命运动出现新的转折。随后，萧述凡辞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兼青年部长之职，并在共青团湖南区委改选时当选为书记，后又

兼管长沙地方团委工作。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湖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但此时他却染上痢疾，竟一病不起，于10月30日在长沙仁术医院病逝，年仅25岁。湖南各界举行了隆重追悼会，省内外报刊连续登载悼念文章。《湖南通俗日报》10月31日第1版刊登了由李维汉、郭亮、夏曦、易礼容联名悼念萧述凡的哀启；同版刊登了曾三《悼萧述凡同志》的文章，文章说：一述凡同志之死，是因为积劳成疾，是为青年群众的解放与自由而死，是为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而死！他的死，虽未死于军阀压迫的刀枪之下，虽未死于与敌人短兵相接之时，其价值依然伟大，其精神且永远留在人间。

我们要继续述凡同志的精神，促进国民革命及世界革命的成功，共促大同世界的实现！我们还要高呼：述凡精神不死！

一封遗书背后的故事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位革命烈士牺牲前写给妻子的一封信。这封被游客称为“最动人心”的烈士遗书，它的背后有着怎样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和人间大爱呢？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述这封遗书背后的故事。

郭亮，第一师范杰出校友，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1901年，出生在湖南望城铜官窑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12年秋，12岁的他考取了当地西湖寺高小预科，并在那里结识了美丽的李灿英，不久，在双方父母的提议下，两人订下了美好的婚约。

1920年，郭亮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同年，17岁的灿英也来到长沙，他们深受时任湖南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的影响，积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之中。中共一大后，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有着共同理想信仰的郭李二人决定正式结为革命伴侣。没有花轿，没有喜宴，在简朴的婚礼中，他们相约要为革命奉献一生。”两年后，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为了革命，郭亮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告别妻儿，四处奔走。他先后担任湖南，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1928年2月，湘北大地春寒料峭，郭亮来到岳阳，准备发动工农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危险正步步逼近，南“铲共法院”侦缉队长左国雍带领侦缉队全体职员，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李维章带领党校学生50余人，秘密前往岳阳捉拿郭亮。反动军阀在长沙张贴告示，悬赏五千大洋要他的人头，可郭亮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深入厂矿、农村，发动、组织群众。1928年3月27日，因叛徒告密，郭亮在岳阳不幸被捕。敌人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党组织秘密，于是连夜对他进行审讯。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当审问者追问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郭亮回答说：“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回答激怒了审问人，他威胁道：“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是中央档案馆珍藏的党史人物传资料库里，记录下的郭亮的全部“供词”。

第二天，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立即执行郭亮死刑。在慷慨赴死的前一天晚上，郭亮饱蘸深情，把对妻子对儿子的爱，凝聚笔端，写下了这样一封感情真挚且震铄千古的遗书：

“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临死日郭亮”。

从署名到日期，这封遗书只有短短33个字。但字字是血，笔笔是心。谁没有父母亲人？谁又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遗书的最后，深藏着一个共产党人勇敢从容的选择和一个父亲，对妻子、孩子难舍的深情。

郭亮牺牲后，凶残的敌人并不罢休，他们将郭亮的遗体摆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当街示众，并将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城门三天三夜。“爱国岂能怕挂头！”12年前，15岁的他就放出过的这样豪言壮语。12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捍卫着共产党人的信仰。

青山埋忠骨，碧血染红旗。回首来路，习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征程，郭亮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遗志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书写，在继承。但英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的故事

1920年初夏的上海，天气炎热润湿。一个身着灰色长衫的22岁青年怀着满脸的兴奋和些许激动，在卢湾区（现黄浦区）霞飞路（现淮海中路）急匆匆走着。

一会儿，他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弄堂前停下了脚步，看着门楣，他的双眼发着亮光，犹豫地举起了右手，扣动了铁环。门开了，这是一位留着中分发型、双目炯炯有神、同样身着长衫的中年人。

青年人激动地说：“您就是陈独秀先生吧？我叫李声，字印霞，湖南人，打听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地方！”

陈独秀看了李声一眼，说了声：“进屋说吧！”

进门一看，“新青年编辑部”的木制招牌让他心潮澎湃。

这个青年叫李声，湖南湘乡石牛(今属双峰)人。读私塾时，他带头剪掉了辫子。1913年，李声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入学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参加社会活动。李声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一师学友会。1917年11月，学友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举办了工人夜学，学生分甲、乙两班，他是乙班的管理员，学校附近一些工厂的工人都熟识他，亲切地称他为“李先生”。他亲眼目睹了工人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辛酸苦楚。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由于局势动荡，李声跟随老师来到上海做了一家古董店的学徒。

1918年底，毛泽东来到天津浦口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此时的他囊中羞涩，仅有的一双皮鞋也被小偷给偷走，正在无所施计之时，恰巧遇上了李声。好友见面分外热情，李声邀请毛泽东去了他在浦口的临时住处，热情招待他吃了顿饱饭，席间，二人叙说了多年各自的人生阅历。当李声得知毛泽东的处境后，二话不说，拿出钱给毛泽东买了去上海的车票和皮鞋，并将身上所有的钱基本都赠给了毛泽东做路费。17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与斯诺谈到这位故友时便称呼他是自己的“救命菩萨”。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广为传播。1920年初，陈独秀来到上海，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在这里扩大发行，吸引着许多有

志爱国青年。这就有了故事开始的那一幕，李中通过多方打听，慕名前往陈独秀的住所拜访。这次李声 跟陈独秀的谈话很投机，陈独秀提议他改名李中。“中”代表着到工人中去，成为工人中的一分子。他建议李声 当一个产业工人，争取实现从知识分子到工人的觉悟蜕变。然后利用工人这个身份，广泛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李中欣然同意。

但是，到哪个厂去当产业工人呢？已经改名的李中心想，要去就去上海最大的工厂，这样才能发动、组织更多的工人。于是，他来到了江南造船所。

江南造船所是清末官办机器造船厂，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上海产业工人的基地，聚集着上万的产业工人。此时船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正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江南造船所招工条件极为苛刻，由于李中没有工作经验，便安排他干最苦最累的力气活：打铁！而且规定：开始没有工资，技术熟练了才能拿工资。

李中想到陈独秀教导的“蜕变”，要完成身份的“转化”，便一口答应了。他使出深身解数，完全豁出去了。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什么镦粗、拔长、冲孔、扩孔、弯曲、切割、扭转、错位、锻接等工艺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厂里的老工人都赞叹说：“真是一把好手！”。这样，第一个月，厂里给他算了6元钱的工资，从第二个月起，就把他的工资标准定到了12元。

江南造船所有很多湖南人。李中身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在语言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其他人而言，湖南话很难听懂，而李中恰巧可以利用这一点，在湖南人聚集的地方开展工人运动。李中通过同乡和知心的工友，广泛联络工人群众。这一切令陈独秀欣喜异常，就邀李中与自己同往。正是在陈独秀的居处，李中得以结识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李启汉和俞秀松等同志。经过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渔阳里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李中是其中唯一的工人党员。李中是标准的产业工人，而且是机器工人。陈独秀发展李中为党员，培养他的阶级觉悟，指导他发动工人、组织工人。9月，李中在党组织创办的《劳动界》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一个工人的宣言》。文章深入浅出地宣传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阐明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并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一大团体”，成为“世界一大团体”。这篇文章发表时，马克思主义还未被广大工人所认识，李中的这些言论非常可贵。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中转为正式党员。

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中还利用自己在工厂工作的优势，帮助陈独秀筹建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召开发起大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就此诞生了。李中负责组织日常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如开办英文义务夜校、组织工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等。工会还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刊物《机器工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受工人喜爱。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会的会员就从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李中积极发动工人投入罢工斗争。李中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上海法租界和北洋军阀的注意，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李中不幸被捕入狱，后经多方努力营救获释。此后，李中脱离党组织返回湖南双峰从事教育工作，开办求实学校，教授新学，培养学生数以千计。

新中国成立后，李中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参加党的工作。毛泽东曾接连三次回信邀他进京。1951年7月9日，李中在赴京途中染病，不幸病逝于益阳南县，时年54岁。

从少年时期开始探索新思想，到后来成为工人，进而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创办上海机器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李中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红色大管家——毛泽民

他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红色金融鼻祖，他用自己47岁的短暂生命，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多个第一：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他创意并发行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股票；他领导发行了第一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和银币。

他就是被誉为红色大管家的第一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毛泽民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大弟弟，自幼在家帮助父亲操持家业，任劳任怨地供养外出求学的大哥毛泽东和小弟毛泽覃。并在父亲的影响下，练就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是韶山冲远近闻名的“小管家”。

1921年，在毛泽东的影响下，25岁的毛泽民毅然走出乡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他利用在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工作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接触进步思想。1922年冬天，毛泽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毛泽民的足迹奔走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从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到上海接手出版发行，从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到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毛泽民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为党的发展壮大积累和筹集经费。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因其出色的理财能力担任第一任行长，成为初生的红色政权的大管家。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启动资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毛泽民总是身先士卒地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来到前线。他走街串铺，积极宣传红军的政策，张贴布告，与商贾名流沟通交涉，迅速得到大小商户的支持，纷纷捐款。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之后，毛泽民在实践中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体制，通过发展生产，繁荣了苏区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中国红色金融事业逐渐步上坦途。

1937年冬，由于长期的艰苦奋斗，毛泽民积劳成疾，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疗时，因中苏边界鼠疫滞留在新疆。应党中央安排，毛泽民留在新疆协助军阀盛世才整顿财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的新疆，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整顿税收，改组银行，改革币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根本上结束了新疆金融的混乱局面，为巩固和发展抗日大后方的经济奠定了基础。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2年，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毛泽民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严刑逼他招认所谓“暴动”的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毛泽民坚定地回答：“我是不会放弃共产主义立场的！”并对战友留下遗言：“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毛泽东的弟弟。”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毛泽民为党工作22年，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身处钱海，一尘不染、一丝不苟，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事业艰难而伟大的道路。他如一座耸立的丰碑，一肩挑起了革命战争的后勤给养，一肩扛起了红色政权金融事业的信念、正义和忠诚！

根、开花结果。当年夜学里的“毛先生”，后来通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印证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而这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从第一师范当年，从毛泽东同学主办的工人夜学中，找到某种源头。

传承百年，工人夜学始终照亮着工人阶级成长之路，温暖着工人的心窝。

一间辽阔的教室——湖南一师旧址第八班教室

“光能照进来，风能吹进来，我在一间辽阔的教室……”

——题记

学生，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教室度过的。

从家庭走进学校，再走进教室，又从教室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可以说，教室里的生活，对学子们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湖南第一师范旧址里有一间普通但意义非凡的教室，它就是来一师必“打卡”的——第八班教室。

说这间教室普通，是因为它与校园里其它所有的教室一样，桌椅、黑板、讲台、门窗一应俱全，是老师们意气风发、循循善诱授课，学生们目光如炬、挥洒汗水、勤奋学习的地方。

说这这间教室不平凡，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见证了百余年前一群人对教育的崇高追求，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艰难追寻以及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这间辽阔的教室里有大境界和大抱负。

走进这间教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整齐的30张课桌，右起第一排第四桌的课桌上有一块醒目的提示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座位”。是的，这间教室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所在的第八班教室。从一个农家学子，历经辗转求学，再成为一名师范生，可以说毛泽东就是从这里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是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觉得开启民智必须从教育入手，并且他认为自己最适合教书，加之经历了半年的军队锻炼，又在省图书馆自修了一段时间，父亲已是非常恼火。经济上的压力，个人前途的打算等等都让他不得不选择结束自修的学习继而报考师范。

于是，同年春，他参加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对于这次升学考试，在自传中，他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当时，有两个朋友，鼓励我进行报考，而且，还让我帮助他俩，也准备一下入学考试的作文，就这样，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没想到三个人都录取了。”